

赋能、网络与制度协同：老年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工作逻辑

朱梓萌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2026年5月6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11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9日

摘要

基于“人在情境中”理念及优势视角、生态系统与社会支持理论，梳理老年智力资源及转化障碍，进而提出通过个案评估、小组共创、社区岗位化和政策倡导，构建“识别”“场景”“保障”三位一体社工介入链条，将老龄经验转化为赋能公共治理与服务的“银龄资源”。

关键词

老年智力资源，积极老龄化，社会工作，优势视角，制度协同，中国式现代化

Empowerment, Networks, and Institutional Synergy: A Social Work Approach to Activating Older Adults' Intellectual Resources

Zimeng Zh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May 6, 2026; accepted: August 11, 2026; published: August 19, 2026

Abstract

Grounded in Person-in-Environment, strengths, ecosystem, and social support theories, this paper examines senior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conversion barriers, establishing an “identification-application-safeguard” social work chain—via case assessment, group co-creation, community placement, and policy advocacy—to mobilize senior expertise into “silver capital” for public governance

文章引用：朱梓萌. 赋能、网络与制度协同：老年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工作逻辑[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8): 274-281.
DOI: 10.12677/ar.2026.138555

and social services.

Keywords

Intellectual Resources of Older Adults, Active Aging, Social Work,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stitutional Synergy,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2025 年末, 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为 32,338 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 23.0%;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为 22,365 万人, 占 15.9%¹, 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与经济社会全面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交汇期。随着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提升, 低龄老年人中存在大量具有专业技能、管理经验和社区服务能力的人群。2026 年 3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专门部署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的年龄限制政策、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拓展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工作岗位², 充分体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精神在国家层面的全面承接与细化落地。法定退休年龄一到, 经验型人力资本便与社会生产网络骤然断裂。健康寿命延长、教育普及, 使低龄老年人依然保有可观的认知盈余与实践智慧, 却因生命周期分段制度与承接机制滞后而闲置。个体主动退隐、资源错配无法囊括这一社会角色剥离、代际知识传递断裂与既有资源配置逻辑滞后于长寿时代的共同结果。破解这一困境不能止于个体生命质量层面的伦理关怀而应上升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国家治理自觉。一段时间以来, 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呈现出“政治权威合理化、行政机构专业化、大众参与广泛化”^[1]的一般规律与特征。既有研究大体沿两条路径展开: 经济学视域将老年人视为劳动力短缺的“替补”, 主张延迟退休; 社会政策视域则以老年教育、文化养老提供补偿性福利。前者困于工具理性, 无视身份重构与关系重嵌的心理诉求; 后者止于福利输送, 难成发展性赋能: 二者共同的盲区是把老年人悬置在家庭、社区与制度网络之外, 触不到经验资源赖以激活的社会生态。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视角由此显出必要: 治理逻辑应从问题救助转向能力发展, 从衰退视角转向优势视角。经验、技能与阅历退休后即被制度隔绝于社会运行之外, 而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亟需经验型治理型人力资源之际, 这一闲置尤为刺眼。社会工作因此需借助社区、社会组织与基层治理的协同重建经验资源与社会需求的连接, 使其从分散闲置走向组织化再生产。

2. 老龄社会智力资源重构的理论逻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指出, 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 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 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³。老年智力资源由潜在闲置走向显性化标志着老龄化语境下人力资源开发范式的深刻转型, 这一跨越在国家战略框架内重新锚定了智力再生产与社会支持的理论及伦理坐标。

¹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²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³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1/content_6926087.htm

2.1. 优势视角下的价值重塑：超越生理决定论的老龄认知

长期以来，传统老龄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常受制于生理决定论的思维惯性，将老年期固化为能力衰退与资源消耗单向度过程，导致老年群体的知识存量与经验优势遭到系统遮蔽。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解构了这一叙事，强调个体或群体在任何环境中均蕴含内生性资源与抗逆力：“相信每个人都拥有趋利避害的理性能力和意愿，主张尊重案主的理性，相信他们可以以理性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选择和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2]。老年期的能力发生是能力结构由执行取向转向判断取向，即从依赖体力速度的标准化技能，转向经验压缩、情境辨识与不确定性处理。这类能力难以被现行劳动评价体系计量，却在复杂决策与知识传递中边际效用更高，构成一种被制度性低估的“沉默经验”。因此重构老年智力资源关键是打通制度的经验转化通道，通过岗位再设计使老年人从直接生产者转为知识中介与经验评估者；通过教育与社会组织的嵌入把个体经验转译为可传播复用的公共知识，老年期对知识协同的再嵌入解构了单向线性的社会时钟。

2.2. 生态系统视域下的互嵌：智力转化的环境约束

“宏观－中观－微观”的理论连续统或被拿来解释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3]。老年智力资源的释放不是单一维度的资源溢出，而是个体能动性与其结构嵌入性在时间长河中耦合的结果。布朗芬布伦纳在生态学的框架内构建了系统模型，包括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观系统、宏观系统以及长期系统五个层次[4]。依照这个理论，老年智力资源的开发受制于微观、中观与宏观环境的交织互动。在微观层面，个体身心机能的退化节奏与自我效能感直接决定了智力外化的原动力，微观系统(Microsystem)构成了老年智力活动的“生活世界”。这不仅关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与认知储备，更核心的是其在家庭、邻里及非正式社交圈中的角色认同。智力资源的原始积累在这一层级表现为知识的代际反哺与经验存续，个体的效能感直接决定了智力产出的意愿强度。在中观层面，家庭结构的代际支持网络、社区教育的资源可及性以及同辈群体的互动频次，构成了智力资源转移的中介机制。中观系统(Mesosystem)发挥着“联结杠杆”的作用。它关注不同微观环境之间的互动质量，如家庭支持与社区参与的协同，或原单位返聘机制与社会组织需求的对接。若中观层面的组织边界过于僵化，老年人的知识存量便会陷入“孤岛效应”；反之，灵动的组织网络则能促成智力资源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有效迁移。在宏观层面，国家层面的涉老政策供给、劳动力市场对银发资源的接纳度以及社会文化对老龄角色的深层期许，形成了规训与激励并存的制度环境。宏观系统(Macrosystem)提供了价值底色与范式引导。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社会文化对“老有所为”的接纳程度、从负担范式向资源范式的观念转型，构成了智力资源释放的制度文化环境。这种宏观叙事赋予了老年群体新的社会契约身份和行动上的合法性支撑。

余下两个添补的系统是“外观系统”与“长期系统”。外观系统(Exosystem)则体现为那些虽不直接参与、却深刻塑造老年生活脚本的间接环境。诸如退休制度的刚性约束、终身学习体系的资源配置、乃至媒介对“老年”形象的框架建构。这些外部结构的变动，通过权力分配与机会供给，隐匿地划定了老年智力资源开发的边界与深度。长期系统(Chronosystem)则引入了生命历程的时间维度。老年智力资源的质性特征随时代变迁(如数字化转型)而动态演化，历史事件与个体生命周期的碰撞，决定了不同世代老年群体智力结构的差异化特征。这样看来，单一的教育活动难以从根本上破除资源闲置的困境。推动老年智力资源重构，必须在个体心理调适、组织机制接纳与宏观制度安排之间建立良性耦合，使教育平台成为衔接微观需求与宏观战略的制度性接口。中国社会老年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本质上是要求在宏观政策的主动作为、中观组织的柔性链接与微观主体的赋权增能之间，建立起一种具有内生动力的生态闭环。这不仅是对人力资源配置失衡的纠偏，更是对老龄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理论重构。

20 世纪 80 年代的杰曼和吉特曼生命模式(Life Model)认为人与环境是互惠的关系,环境是一个有着不同层面的系统,人是一个适应环境变化以及生命不同阶段变化的主体。服务对象的问题源自其面对环境压力时应对压力的能力和资源的不足。社会工作干预在于提高个体应对压力的能力,改善并形成支持型、滋养型的社会环境。这一实施过程包括初期、持续和结案三个阶段[5]。基于生命模式,人与环境乃是一种互惠共生的生态关系,环境构成了具备多维层面的复杂系统,而人则是积极调适环境变迁及生命周期演进的主体。老年群体在退出常规劳动力市场后所遭遇的智力闲置与角色边缘化本质上是生命周期演进中个体经验资源与外部环境需求间结构的失配(Mismatch)。这种失配不仅构成了老年人再社会化过程中的核心压力源,更凸显了现有社会支持网络在赋能性资源供给上的滞后与匮乏。因此,突破智力转化的环境约束不应仅仅停留在浅层的知识补偿与文娱消遣,而须升华为一种系统性的生态干预与环境改造策略。

在干预的初期阶段,重塑老年个体的人境互惠关系表现为压力解构与优势重塑的辩证统一。面对衰老带来的生理机能退化及社会角色剥夺引发的适应上的焦虑,干预机制需精准切入个体的意义世界与主观认知结构。通过生命回顾与价值澄清等主体性赋能路径,引导老年人从衰退的接受者向经验的持有者进行身份认同跃迁,激活其内在的自我效能感与智力外化意愿,为后续资源嵌入与社会嵌合夯实主体动力基础。进入持续干预阶段,任务由微观的主体性重塑转向中宏观层面“滋养型环境”(Nourishing Environment)的生态建构,致力于破除宏观政策制度、中观社区网络与微观家庭场域之间的阻隔,实现赋能要素的生态聚合:其一,在支持侧,依托社区教育网络与适老化数字基建,消解老年群体面临的技术鸿沟与信息孤岛,为其智力资源迭代更新提供基础的环境反哺;其二,在输出侧,将多元化的智力释放渠道制度化地嵌入社会结构腹地,如创设银发智库、构筑代际共学机制、拓宽社区柔性治理网络等。通过常态化的制度性通道,老年群体的默会知识与阅历资源得以合法地转化为应对社会变迁的公共资源,进而高频、深度的社会互动中消解社会对老龄群体的刻板印象与排斥。及至干预的结案与常态化维持阶段,则指向的是促成人与环境关系在更高水平上的重新均衡与深层互惠。生命模式与生态系统的双重视角深刻表征了这样一个命题:老年智力资源释放的表象痛点虽系于个体潜能的隐匿,但其症结根植在支持的缺位上。由此观之,社会工作干预的终极关怀,必须从传统补救亏缺视角彻底转向优势赋能视角。通过对环境压力的系统性疏解与滋养型社会网络的重构,方能真正跨越既有的环境藩篱,实现老年智力资源从被动沉寂向主动嵌合的范式转换,最终达成生命尊严与社会发展的共生共荣。

2.3. 社会支持网络中的资源流转:智力资源的社会化路径

知识资源由潜在储蓄向社会价值的转化,高度依赖于特定社会网络结构的支撑。“一般而言,个人通过与他人的联结,能够构筑社会整合感或感到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关系到个人的生存”[6],这样的社会支持网络理论揭示了关系强度在资源配置中的异质性功能: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强关系”为老年群体提供基础性的情感慰藉与身份安全;而以业缘和趣缘为依托的“弱关系”则能有效跨越同质性群体的边界,促成异质性信息与社会参与机会的流动。在现实语境中,老年智力资源能否有效嵌入知识传承或公共治理,关键在于能否重构其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日益萎缩的社会网络。高校老年教育机构与社区服务平台在此扮演了核心的中介角色,其本质是为老年群体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制度性“弱关系”网络。通过代际融合项目、智库咨询站点与志愿服务平台,将原子化分散的老年个体重新编织入现代社会的公共网络之中。在此意义上,干预逻辑已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向了社会资源的联结与关系网络的重组,进而有效提升整个社会的智力资源循环效率。进一步地,有关方面可通过参与频率、服务时长、跨代互动次数、项目产出、社区反馈和持续参与率来评估社会支持网络是否真正促进智力资源转化。

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首次明确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

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拥有相互认可或制度化的持续网络关系有关”[7]，从社会资本生成的逻辑看，老年智力资源的衰减并不是年龄增长的自然结果，而是现代制度将个体生命历程切割为生产期与退出期之后所造成的必然后果。职业退出使原本嵌入组织体系中的知识、经验与判断力脱离其生成场域，文化资本因失去制度承认而难以完成向社会资本的转换。社会网络的意义正在于重建这一转换机制，使个体生命经验重新进入社会关系的流动过程，并在公共实践中获得新的价值确认。由此，老年智力资源开发并不是对既有能力的简单延续，而是通过关系结构的再组织，改变老年知识的社会存在方式，使其由私人生命积累转化为公共行动能力，并推动老年主体重新参与社会意义的生产。

3. 教育赋能与智力转化间的现实困境

从理论逻辑向实践场域转换时，老年智力资源的重构面临着复杂的现实制约。当前，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践探索中，教育赋能与老年群体实质性的智力参与之间仍存在一定隔膜。

3.1. 供给导向的偏置：补偿福利与发展赋能的龃龉

经历“个体本位”的“功利化”到“社会本位”的“工具化”[8]，当前老年教育正由福利补偿走向资源开发，但其发展逻辑尚缺乏相应的制度承载与运行机制。诚然，从代际关系和文化遗产的角度看，文化养老体现了家庭结构中亲子关系的反馈模式[9]，伦理回馈逻辑虽然维系了老年群体的情感联结与生活秩序，但其作用仍局限于生活世界内部，难以进入社会分工与知识生产体系。由此，部分老年教育仍停留于文化养老范式，课程供给偏向休闲娱乐与健康养生，未能回应低龄、高知老年群体的深层参与需求；而部分能力开发项目又简单移植劳动人口培训模式，忽视老年经验的特殊价值。两种倾向共同造成福利保障与能力发展的分离，使老年教育难以成为智力资源再生产的制度平台，根本问题在于制度对老年主体身份的预设而不是存量不足。现有供给体系倾向于将老年人置于被照护、被服务的位置，使教育更多承担风险缓冲与闲暇调适功能，而非促进知识转化与能力重组的公共机制。由此，发展型养老的关键不在于简单扩展课程体系，而在于建立经验向公共参与转化的制度通道。社会秩序的稳定来自当下的客观事实性与主观意义性的文化结丛。按照贝格尔的说法，人类具有追求意义和秩序的本能，无意义和失范对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恐怖[10]。从知识社会学视角看，人的生存不仅依赖物质供给，更依赖意义秩序的维系。老年群体的问题并非单纯的资源不足，而在于其长期积累的经验、知识与社会价值之间的连接被制度性割裂。退休之后，职业角色的退出使大量嵌入实践、关系与生活世界中的经验失去转化渠道，老年人由社会生产的参与者逐渐被置于被照护、被管理的位置，进而产生角色消解与意义抽离。现有老龄治理体系尚未建立将个体经验转化为公共能力的中介机制。一方面，老年智力资源常被简化为休闲娱乐资源；另一方面，部分开发模式又以劳动标准替代经验逻辑，忽视老年知识的情境性与社会价值。由此，“积极老龄化”等理念若缺乏社区组织、社会网络与制度接口的承接，更容易停留于价值倡导，而难以形成实践机制。其根本困境在于，老年经验尚未完成从私人积累向公共资源的制度转化，老年主体也未能在社会参与中重新确认自身价值。

3.2. 协同治理的羁绊：条块分割与资源整合的制度壁垒

老年智力资源的系统性开发，依赖于隐性经验显化、服务模块提炼与场景精准对接等微观专业技术的有效支撑。从治理视角观之，民政、教育与基层社区等部门因职责分工不同，呈现出多元化的实践侧重。微观技术的深度落地，尚需高阶政策平台的统筹引导与跨部门接口的持续打通；高校老年大学等阵地的高端人力资源，亦有待通过认证与激励机制的健全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流转。立足于供需动态匹配的理路，进一步强化条块间的协同效能，方能为积极老龄化社会参与体系的构建注入更为充沛的制度韧性。

3.3. 社会化进程的阻滞：角色退出与身份重构的脱节

退出劳动力市场是个体社会角色与意义秩序的重新调整。退休使原有职业身份、组织联系和社会期待逐渐弱化，相应的再社会化机制缺位会导致部分老年人陷入角色转换滞后与自我效能下降困境，积累的专业经验与社会资本因此难以进入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老有所为”需要制度提供角色承接与参与平台，老年智力资源的激活不仅依赖物质条件改善，更需要在社会认同与制度支持层面重建老年人的公共参与资格。

4. 老龄智力资源转化的方法路径整合

社会工作连接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能够在老龄智力资源的识别、整合与制度转化中发挥中介作用，推动老年人力资源由潜在存量转向公共能力。老年智力资源能否实现社会转化取决于个体参与意愿、社区组织承载能力与制度支持机制三重条件，三者共同构成经验由私人积累走向公共价值的转换链条。

4.1. 叙事建构与资源盘点：微观层面的主体唤醒

个体智力资源再激活的逻辑起点在于重塑老年群体的自我效能感与角色认同。有别于传统的“安置型”服务，社会工作的介入重在通过生命历程视角实施深度的个案赋权。生命历程理论关注个体发展的多重轨迹，旨在通过描述个体生命轨迹及其转折的顺序，将生命的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相联系^[11]。此视角下的衰老超越了功能退化与角色退出的单向定性，呈现为历史时间、社会关系与主体能动性交互重塑的生命转折。社工干预的深层逻辑在依托“关联的生活”重构主体能动时将生命积淀转化为行动效能，确立其由被动受助向能动参与跨越的合法性。这要求干预范式从传统的补缺型需求填补转向资产取向评估，进而破解智力资源深厚蕴藏与微观需求高度碎片化之间的深层悖论。

有学者通过实践研究发现，老年人普遍对“医疗保健”和“购物”方面需求较高，对“金融”“交通”方面需求偏低。但是他们同时发现，需求较高的生活类型也可能包含权重值低的公共设施项^[12]。老年群体的结构异质性，宣告了同质化照料供给的失效。社会工作介入须穿透表层生活抚育，依托叙事建构与生涯回顾，将老年人沉淀的经验与智慧等隐性知识显化为智力资产，实现智力资源由存量蛰伏向增量激发的跨越。这一微观主体的唤醒，打破了“衰老即无用”的被动隐喻，促使老年人由资源的纯粹消耗者重塑为治理与知识的协同创造者，有效缝合因退职而断裂的社会连接。微观个体赋权与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宏观战略在此达成辩证统一，为中观代际互融与宏观政策重构奠定了坚实的逻辑起点。

4.2. 代际互融与网络重组：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源扩容

智力资源的社会价值必须在关系网络的互动中方能实现最大化。小组工作方法的介入，旨在构建跨越年龄与专业壁垒的知识共创共同体。在这一场域中，老年专业人士、中青年骨干及相关领域的研习者得以围绕特定的基层治理议题或技术攻关项目展开协作。此机制下的老龄智力资源不再是单向度传承的静态遗存，而通过代际间的协商、互补与知识碰撞转化为流动且不断增值的公共品。这种代际互构引发的增量重组着老年群体日益萎缩的社会支持网络，将强关系的情感支撑与弱关系的资源引介相融合，有效拓展了智力资源的辐射半径与转化效能，遂能进一步保证“人口变化与公共服务供给相匹配、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13]。多元主体的组团化协作，推动了隐性经验向具身化治理工具的转化。例如，专业传承小组凝结的课程与案例库、社区治理小组输出的议事规则与治理建议以及数字互助小组孵化的代际合作项目共同构成了经验显化的实体载体。智力资源的激活有赖于“主体”“资源”“场景”契合，需要涵盖专业技术、组织管理、公共治理、文化传承与生活照护的五维资源体系并在多元场域中展现出精准的嵌入逻辑：以退休教师、医生为代表的专业技术型资源赋能科普咨询、

社区健康与乡村振兴；以退休干部、管理者为代表的组织管理型资源融入社区议事、矛盾调解与组织培育；以社区骨干为代表的公共治理型资源充实基层协商与治理顾问；以非遗传承人、文史爱好者为代表的文化传承型资源依托地方知识与历史记忆活化代际课堂与社区博物馆；而以长期照护者与家庭能人代表的生活照护型资源，则将日常护理智慧反哺于家庭教育与互助养老。这种全景式的分类映射与场景下沉，打通了从个体经验到公共资产的转化路径，为中观行动者网络的重构与社会资源的系统扩容构筑了坚实的实践枢纽。

4.3. 场域下沉与在地转化：高校与社区的协同赋能

老年教育资源不应停留于体制内循环，应进一步转化为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资源。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承担着制度连接与关系协调的作用，推动高校、社区、社会组织之间形成稳定的协同机制。依托高校老年教育平台的资源优势，促进终身学习机构、社区组织与公共文化设施之间的资源共享，将专业知识、人才优势与基层需求有效衔接，并通过探索“社区智囊工作站”“银发顾问岗”等机制，使退休教师、专业技术人员等重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实现老年知识资源的社会转化。这样可以极大延展老年教育功能，推动老年群体由教育接受者转向社会参与者，为基层治理注入持续的经验资源与公共力量。

2025年，《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 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提出引导各类涉老社会组织发动老年人参与民生保障、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文化传承、乡村振兴、环境治理、全民健身等事业发展⁴，“老有所学”不应止于满足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应进一步转向“老有所为”的治理实践，将老年教育纳入基层治理和社会共同体建设的整体框架。其关键在于推动老年知识、经验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有效衔接，通过能力评估、岗位匹配、反馈激励等机制，促进老年参与由自发性、零散化实践走向制度化、持续性参与。实践中，可围绕基层协商、青少年教育、健康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探索设置社区议事顾问、成长导师、健康科普志愿者、文化记忆整理员等岗位，使老年群体积累的知识经验转化为基层治理资源。由此，老年教育的功能也由个体生命延展走向社会价值再生产，成为连接知识传承、公共参与与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纽带。高校与社区的协同赋能，实质上是在重新组织老龄社会中的知识流动与关系网络，推动老年群体从服务对象转变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

4.4. 制度倡导与跨界协同：宏观层面的政策效能优化

微观与中观层面的赋能实践若缺乏宏观制度的保驾护航，极易陷入碎片化与不可持续的困境。社会工作基于一线的实务证据，需积极履行政策倡导功能，推动老龄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环境优化。其倡导向度主要聚焦于三方面：一是推动构建科学适用的老龄智力贡献评价与认证体系，赋予非雇佣形态的专业咨询、志愿指导等智力付出以合法的社会可见度；二是倡导建立弹性、多元的权益保障机制，通过正向激励消解现行制度对老年智力溢出的隐性排斥；三是致力于在更高层面上促成教育、民政、人社等职能部门的协议式协同，打破碎片化治理窠臼。通过将一线的实践经验升华为制度议程，为老龄智力资源的长期维系提供刚性的政策依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时代主旋律，这不仅为老龄社会的治理提供了全新的政治坐标，更在实践逻辑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赋能”的破题之要。西方治理范式的演进源于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可逆变动对传统公共资源配置与利益协调机制的倒逼，同样决定了社会政策必须由碎片化的被动回应向系统性的主动治理转型。此背景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我们在微观层面重新激活老龄群体的主体性。然而，宏观制度的有效运转若脱离微观个体的生命演进脉络，极易陷入政策空转与资源错配。理解老龄社会的复杂与异质，亟需将视角从静态的结果干预向动态的过程演进延伸。事实上这种对个体

⁴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5/content_7025060.htm

动态发展的理论关照，早在 20 世纪初期便已见端倪。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与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中，前瞻性地提出了“生命历史”(Life Histories)与“未来轨迹”(Future Trajectories)的分析概念。他们通过剖析跨国移民的生活史，确立了对个体“生命路径”(Life Pathways)进行纵向考察的学术传统[14]，因而老年群体的脆弱性与需求特征是个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下长期互动的累积结果。现代化的老龄社会治理要求行政机构在横向上实现专业化协同，更要求公共政策在纵向上契合生命历程的动态演变。唯将广泛大众参与置于个体生命轨迹的全周期中，以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为赋能导向，方能实现个体生命历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良性耦合。

5. 结语：迈向全生命周期智力开发的新发展格局

明确要求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上层建筑之一。老年人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更新和现代转型进程中的宝贵财富，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15]。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宏观语境下，老龄智力资源的再开发已超越了单一群体的福祉范畴，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转型与人力资源优化的关键命题。实践表明，缺乏系统性制度支撑的局部干预，难以从根本上化解老龄社会的结构矛盾。由终身学习体系、在地社区参与平台、弹性化公共与市场吸纳通道深度耦合的协同治理框架下的社会工作，作为需求的精准识别者与资源的跨界整合者，能够有效弥合微观主体诉求与宏观政策导向之间的罅隙。当老年智力资源的开发真正摆脱部门分割的局限，上升为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源开发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时，它不仅将重塑老年群体的社会价值坐标，更将成为增进社会韧性、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动经济社会包容发展的深层力量。

参考文献

- [1] 塞缪尔·亨廷顿, 著.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 刘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1-308.
- [2] 孟洁. 社会工作优势视角理论内涵探究[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4(1): 55-64.
- [3] 李钧鹏, 周港. 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积累与遗忘(1980-2022) [J]. 社会学研究, 2024, 39(1): 21-44, 226-227.
- [4] Bronfenbrenner, U. (1986) Ecology of the Family as a Context for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 723-742.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22.6.723>
- [5] Germain, C.B. and Gitterman, A. (1980) The Life Mode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92 p.
- [6] 范明林.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 4.
- [7]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 J.G.,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Greenwood Press, 241-258.
- [8] 屠明将, 陈明建, 韦永胜.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主体间性”老年人力资本开发的范式转型[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6(8): 104-112.
- [9]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3): 6-15.
- [10] 程郁. 天命何以成为“知识”——知识社会学视域中的《春秋繁露》天命论[J]. 哲学动态, 2026(3): 76-92.
- [11] Elder Jr., G.H. (1998) The Life Course as Developmental Theory. *Child Development*, 69, 1-12.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1998.tb06128.x>
- [12] 何静, 周典, 戴靓华. 基于需求理论的城市养老生活关联设施评价体系研究[J]. 建筑学报, 2020(S2): 37-44.
- [13] 曹萍, 邓艳.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1): 13-22, 228-229.
- [14] 熊春文, 张彩华. 西方老龄社会学: 渊源、演进与流派[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8(5): 63-73.
- [15] 田存全. 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银发力量[N]. 广东科技报, 2026-04-17(014).